

寻找慈善传统

会泽铜商文化中的公益慈善

明清时期,云南会泽(时称东川府)因铜矿开采跃升为全国经济重镇。清初朝廷推行铜本位制度,“雍正四年至宣统三年186年间,东川府粗铜产量达75.17-90.42万吨。东川铜产量占全省铜产量的74.15%,占全国铜产量的62%,无论是铜厂数和产铜数均为全省全国之最”,吸引了赣、浙、桂、黔、川等十一省移民涌入,“商贾云集,八方辐辏,俨然一都市”。这场规模空前的资源开发与人口流动,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勃兴提供了双重动力:一方面,铜商积累的巨额财富为慈善活动奠定物质基础;另一方面,移民社会的多元整合催生了以会馆为核心的地缘公益网络。

“政府+民间”的双轨公益慈善力量

会泽地形复杂,海拔高差3300多米,气候差异巨大,旱灾、水灾、霜冻、低温冷冻、冰雹、泥石流等不时都有发生。据统计,从清朝咸丰八年(1858)到1948年,有较大水灾23次,旱灾12次,霜灾4次,共49次。每每灾害发生,会泽都会形成政府主导、民间参与的救助形式。“咸丰八年,岁大饥,瘟疫流行,死者万余人,阖郡官绅倡捐米粮粥汤于四门,逐日赈济”,表明官方(府级机构)发起赈灾,地方士绅(民间精英)负责物资募集与分发,实现资源整合。又如,同治十年(1871),“夏,东川连旬淫雨,大水飘来,平地水深数尺淹至北门,经月始退,岁大饥,减免钱粮四成。”同治十一年,“夏季雨水过多,田地淹没应征秋粮给予减免,以纾民困。”这些历史表明,在灾害应对中,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,通过政策调节和资源调配,尽力减轻灾害对民众生活的影响。

当官方救灾缺位时,民间社会则展现出高度自组织能力。1934年,会泽城区流行鼠疫,患者旦发夕死。发儒街死亡人数过半,有一家人死光。疫势继向马武、华泥乃至者海石头河蔓延,当局无法防治任其蔓延。中医、商会各界自动组织施药会,募集资金,生产成药向城乡人民免费分发。政府没有救灾措施时,也有官员私捐者,如光绪二年(1876)载:“四月不雨,早魃为虐,民饥而谋食者转徙道路。学官马晋三来东川府科试,捐养三百金,郡人感其,踊跃捐资,计得银三千余两,以赈饥民。”以上例子揭示了民间力量在制度缝隙中的自觉补位作用,反映了会泽县深厚的社会互助传统。

而水利领域更是会泽“政社协同”的典范——政府提供制度与资金保障,民间贡献资金与技术,形成可持续工程管理模式。在清代东川的水利建设中,成效显著的有娜姑的隧洞引水工程和泄水工程。雍正时期,娜姑缺水,“是以彼耕此辍,人民转徙,从无定业”。雍正末年,当地人郭开甲、陈世通、陈启义三人集资开凿水槽子隧洞,引以礼河水,灌溉娜姑田地,后因资金不足停工。这呈现出单纯民间力量的局限性。乾隆十年(1745)东川府借库银一千两,政府介入,由艾启和、艾馨、郑荣之等户续修,于嘉庆四年(1799)开通,洞长1023.5米,由乐里村出口,并开碾子沟、红岩沟、后沟、乐里新沟灌渠道。但由于无出口泄水,汛期往往淹没田亩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6)东川知府令娜姑大户郑兴东,于棠梨山脚凿泄水隧洞。咸丰十一年(1861)建成,至此,娜姑海坝排灌具备。历代会泽县兴修的水利工程,都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。如娜姑小洞隧道



会泽会馆建筑群,由清代建立的八大会馆组成,是研究铜商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

“明清时期会泽依托铜商经济勃兴,构建‘政府+民间+行业+会馆’四位一体的慈善网络,通过义学兴办、恤贫济困、地方建设等领域的公益慈善实践,昭示会泽县域‘以商济世’的伦理精神与‘地方共同体’建构逻辑。”

通水后,即划定岁修田,固定管水员,每年按时维修隧道,疏浚和加固渠道。通过水利建设的“政社协同”的演进逻辑:政府通过政策制定与资源调配确立框架;民间力量在危机中自发行动;官民分工实现技术、资金与管理的优化整合。

捐资助学:教育公益的绵延传统

会泽官绅商民素有重教传统,捐资助学传统始于清初,并贯穿至民国时期,其核心是政府、商界与民间的协同投入,形成“官捐+商助+民参”的多元投入机制。这种机制不仅塑造了历史上的教育繁荣,还推动了科举繁荣与社会流动。他们捐赠的银两、田亩,为发展会泽教育,改善办学条件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据史志记载:会泽历史上的几任知府、知县,都曾捐赠财产,资助教育。自康熙三十八年(1699)“献上设流”后,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外籍流官,便十分重视教育。雍正五年(1727),知府黄士杰于东外街距城鼓楼50米处设义学。雍正十年(1732),知府崔乃镛改义学为书院,崔乃镛捐束修购置学田和铺面作为书院儒学月课及诸生膏火。此为东川府最早开办的书院。官员带头捐体现了“政府主导”原则,官员以个人财产或公帑支持教育,既强化了政府权威,又通过科举制度促进社会阶层流动。这种模式类似于现代公共财政投入,但更具个性化色彩。

民间则有宗祠办学与义学网络。最有名者为会泽海坝石鼓村何氏于乾隆四十九年(1784)于其祠开办的义学,祠堂内请先生教书,族人子弟入学免推馆金,应童试于或乡试的子弟,还给予奖励。光绪初年,东川府的义学发展进程迅速,可以说遍布四乡八里。这些由乡里创建或由士绅

富户捐资兴办的学堂,置学田房产作为经费来源,免费招收彝族、汉族子弟入学。私塾在原有的基础上,办学数量有较大的增加,据不完全统计,清末东川府的私塾就有70多所,除少数富户邀师在家教海子弟外,多为清贫之士设馆授徒,收取学费。也有全村共同请师办学的,其生活待遇由学童家庭负担,学年无限。商界与民众通过宗族、行会等渠道参与教育,形成“自下而上”的补充机制,体现了社会资本的力量,这种分散化的慈善投入增强了地方教育韧性。

民国时期,教育经费危机催生集体行动模式。为筹措教育经费,1941年元月,会泽城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“捐资兴学运动新春游艺大会”,各校师生纷纷走上街头,或发表讲演,或演出节目,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。儿童们将刚得到的“压岁钱”、小贩们把当日收入,纷纷投入捐款箱。许多公司、单位也都积极捐赠。这次活动共集资金1717.40元,作为幼儿教育基金,于同年创办了会泽历史上第一所幼稚园。此运动将“官捐+商助+民参”融合为全民参与机制,政府(公职人员)提供组织框架,民间(商会、师生)执行募捐,体现了危机下的社会自治能力。

基于业缘关系的公益慈善组织

清朝乾隆、嘉庆、道光约一百余年间,会泽铜冶大开,铸钱鼎盛,商贾云集,百业俱兴。各行各业为维护自身利益,建立了各种行会,这些行会有规章,对交流技艺、传递信息、扶危济困等方面,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各行业以“开山祖师”信仰为精神纽带,建立行会组织,这种将神话传说与行业技艺传承相融合的方式,本质上是通过文化符号来构建行业认同与凝聚力。

会泽行会具体包括以下六家:轩辕会,于财神庙内建轩辕殿,缝纫、纺织、毛皮等手工业每年农历九月十六日(轩辕黄帝生日)办会;鲁班会,于西外街修建鲁班庙,建筑行业每年五月初七(传为鲁班生日)办会纪念这位卓有成效的艺人;老君会,于东外街黑神庙对面建庙,铜、铁器业行会于二月十五日集众办会;吕祖会,于白衣阁建偏殿吕祖阁,金、银器业每年四月十三日办会;孙会,于财神庙东南角建孙祖殿,制鞋、板皮业正月初三、九月十三每年集会两次;梅葛会,于财神庙建梅葛殿,印染行业三月三日集会。该六大行会均以神格化行业创始人作为精神核心,其功能远超越经济协作,还囊括仪式性整合和技术型垄断,本质是行业自治组织(业缘)与地缘社会组织(地缘)在神缘纽带下的融合,形成独特的“三角稳定结构”。

铜商文化中的会馆慈善

东川府诸多会馆的建立,满足了各省籍人士异地寻根的需要,使他们的乡土观念在一定时期内较久地保存下来。同时,广大贫民、矿工、手工业者、贫苦农民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照顾,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,已然成为地方主流的系统性慈善平台。会馆是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,以“答神麻、笃乡谊、善举”为旨趣,遵循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意识观念,倡行义学、义诊、恤贫、助老等慈善活动,秉承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重要思想;它们为同乡提供寄居场所,帮助同乡谋求生活职业,接待原籍客商、学子,调解经济及家族、家庭纠纷,办理同乡丧葬事宜,培养本籍幼童入学。而铜商文化中的会馆慈善,其本质是传统商帮在地缘、业缘、神缘三重纽带下构建的社区自治型公益慈善体系。其以多元筹资和制度化支撑了持续性救济济活动,既强化了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,也成为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。这一历史实践不仅彰显了“商善互动”的中国智慧,更为当今慈善事业提供了“自我造血”“社区参与”等宝贵经验。



始建于康熙五十年的会泽江西会馆

会泽会馆慈善的募捐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。同乡捐赠:陕西会馆的《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》就载会馆建盖之初,有邱姓捐赠水田十余亩。其后,陕西、山西移民在会泽县城所开布行,又联合募捐六百八十多两,用以维持会馆的日常开支。根据现存《东川湖广会馆传书》记载,乾隆四十三年(1778)的捐资人员姓名和单位刊目,宝云局的湖广籍匠役人数众多和个人出资数额较大,特别令人瞩目,并且全部以银捐赠,而不是用他们铸造的钱文来借花献佛。

戏剧募款:乾隆四十八年,湖广会馆修复观音殿观音大士像龛时,各有关单位都来庆贺,也请戏班演出。《东川湖广会馆传书》也记载了这次参与单位的“戏文”钱:“长沙府戏文礼物外钱四十千文。衡州府戏文礼物外钱一百零五千。水碾额联、戏文礼物外钱五十三千。宝云局额联、戏文礼物外钱三十八千。武岳二府戏文礼物外钱十六千。米粮坝额联、戏文礼物外钱七十九千。碧谷坝额联、戏文礼物外钱四十四千。铅厂额联、戏文礼物外钱四十四千。江西全省、彩缎、戏文、礼物外钱二十千。江西临府彩缎、戏文、礼物外钱二十千。酒商戏文、彩缎外钱十七千。西蜀全省额联戏文礼物。黔省戏文礼物。”

社会捐赠:会泽县城东郊的湖广会馆,始建于康熙年间,到乾隆三十四年修缮过程中,湖广会馆举行了一次募捐。刊刻于乾隆四十八年的《东川湖广会馆传书》共分为六卷,据不完全统计,总计捐资人数为4034人,总计收得捐赠银15638两。

传统慈善的近代化重组

晚清民初,西方公益理念传入,会泽慈善呈现“传统内核+近代形式”特征,从“满足紧急生活需要”的个体互助拓展为涵盖“人与自然、环境、艺术”的公益事业,与此同时,商会取代行会

成为公益中枢。辛亥革命胜利后,1917年2月2日重建会泽商会。当时农商部定名为东川县商会(当时会泽县为东川县)。商会设会长、副会长各一人,会董20人,任期两年。1931年,有工商业者821户,商会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,下面有屠宰、制革、染坊、银器、毡棉、杂货、铜器、成衣、医药和食宿等10个同业公会。1948年4月,商会进行工商业登记,条件是有资本及营业场所、有从业人员、有营业账册。

1919年,会泽民间的慈善机构“同善社”首次在县城种“牛痘苗”以预防天花。在此之前,会泽民间预防天花均由民间的“痘先生”采用天花患者痊愈后的痘痂捣碎为末吹入鼻腔,以传播轻型天花的方式而使患者获得终身的免疫效果。此次“同善社”的接种牛痘苗虽苗苗有限,接种面不广,种后也无跟踪观察资料,成绩不算大,却从此揭开了会泽采用西医药防病治病的新篇章。

清光绪十六年(1890)9月由英国牧师在会泽创建了“云南会泽基督教圣道公会恩泽圣堂”(俗称耶稣堂)。传教士们出于自身保健的需要往往随身携带少量自用西药,偶遇教友染疾,他们亦赠施医药,由此医药便开始在教会内流传使用。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和出于传教布道的需要,基督教圣道公会于1931年在会泽县城创设“新华药房”为其附属的“慈善”性医药机构,这是会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西医药机构。

1932年,果木法师在斗姆阁成立会泽佛学社。当时会泽僧尼分为出家受戒和在家居士两类,言行组织松散,且此前成立的会泽县佛教分会与果木法师教理分歧较大。佛学社以研习教理、弘扬净土法门为宗旨,团结僧尼,规范其言行,革新寺庙积习。1940年佛教分会解散后,佛学社愈发兴旺;1948年佛教会与佛学社合并,由果木法师主持工作,直至新中国成立。此外,果木法师积极参与地方实业建设,获“实业和尚”尊称。20世纪30年代,他带领弟子勘测开发城郊头塘煤矿,用煤矿烧石灰替代柴火,减少木材砍伐,践行佛家慈悲济世精神,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。

清末刘克升从日本留学兼考察学务回到会泽后,深感县城戏剧演出场地(戏台)之多,戏剧爱好者之众,通过戏剧演出产生教化作用之大,于1912年3月创建业余演剧组织“清明会”,后改为“翼教社”。刘带头捐银百两,各会馆、寺庙、商号也捐资赞助,购置了服装和文武乐器,还明确行当及业务分工。这是会泽县第一个戏剧班社组织。1917年,昭通大关地震,翼教社到昭通参加义演,赈济灾民。1927年,应唐继尧部属滇东镇守使邀请,赴昭通演出,因艺德双臻,受到好评。

会泽铜商文化中的公益慈善,是一部跨越三百年的“善道至臻”史诗。明清时期会泽依托铜商经济勃兴而构建的“政府+民间+行业+会馆”四位一体的慈善网络,无不彰显中华民族乐善好施、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。铜商巨贾的慷慨捐输、会馆地缘组织的制度性善举、行业业缘互助的精准帮扶,以及官绅商民合力兴办教育、赈灾济困的多元实践,共同编织了一张县域公益慈善之网。

(摘自《曲靖师范学院学报》2025年5月第44卷第3期,原标题《会泽铜商文化中公益慈善的多维实践与近代转型》,作者夏福立、邓玉函)